

赵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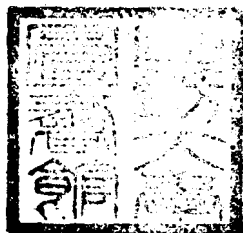
志
征
何
寒





长征风云

赵蔚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601100 32

内 容 提 要

《长征风云》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将对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壮举进行正面的、全景式的描写，以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

《长征风云》的历史背景为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中央苏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红军失利，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作品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遣信使归国传达国际指示为序幕，真实生动地反映出长征前夕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和党内、军内复杂激烈的斗争。情节环环相扣，故事跌宕起伏，既有缠绵悱恻的儿女恋曲，又有刚烈悲壮的英雄颂歌。

作品视野辽阔，气势磅礴。它以丰厚的史实为坚实基础，塑造出包括革命领袖、党内错误路线的领导者、红军各级指战员、蒋介石统帅部的将校、日本关东军头目和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内的众多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真实地再现出发生在三十年代中华大地上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堪称一幅气魄宏伟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长篇历史小说——长征风云

赵 蔚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2.75印张 2插页 258千字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册 定价 3.10元

定价0.10元(精)

目 录

第一章	赤都星光	1
第二章	远方归来	48
第三章	南线行	104
第四章	“满洲”掠影	159
第五章	瑞金记事	216
第六章	金陵秋雨	267
第七章	肃反风波	321
第八章	于都惜别	379

第一章 赤都星光

莫斯科的仲秋，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黄昏时分，夕阳西下，眩目的绯红色霞光，铺洒在这座巨大都市的无数个各式各样的屋宇顶上，构成一幅气派宏伟、色彩斑斓的图画。那些浴在晚霞之中的屋宇的确风格不同，色泽迥异，其中有东正教堂式的，有彼得大帝式的，还有少数罗马式、哥特式及近代日尔曼式的。

然而，更多的屋宇则是近些年来新建成的办公大厦和高层公寓的顶宇。这座位于坦荡的东欧大平原中央的具有八百年悠久历史的俄罗斯名都，如今的建设规模比帝俄时代扩大了数倍乃至十数倍。新的大型建筑物、建筑群一座座、一片片地拔地而起，经过加宽改造过的市区主要大街笔直气派。此外，市郊那些新近投产的大型工业企业的数百座高耸的烟囱所喷发出来的黑褐色的烟雾，更使都市上空凭添了一种工业大都会所特有的灰蒙蒙的色彩。此刻，这种令世世代代的农民们羡慕的“工业色彩”，在绯红的晚霞辉映之下，更产生出一种鹅黄色的、泛着青光的、近似乎神奇的景色。

在莫斯科市区的中央，浅灰色的克里姆林宫塔楼昂然矗立在宽阔的红场侧畔。它那已经有些黯淡的琉璃瓦镶嵌的塔尖直耸云天。塔尖上那颗十分著名的红星，也在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的衬托下，显得有几分发亮了。

深红色的、高高的克里姆林宫宫墙，蜿蜒伸展，望不到尽头。红场上等待瞻仰列宁遗容的人流，此刻只剩下不及白天人数的十分之一，具体讲只剩下区区一两百人了。今天的瞻仰接近尾声，仍在排队等待的人们都怀着敬仰和虔诚的心情，期望着轮到自己去瞻仰那位已经长眠墓中十个年头的伟大的革命导师。人们都在心中庆幸，终于可以在一天瞻仰时间的最后时分获得这一珍贵的权利了。不然的话，他们明天还得重新排长队，重新等待若干个小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莫斯科人，而是来自伏尔加、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甚至远东的城市和乡村、山区和草原。另有少数人来自苏联以外的国度，来自那些哼一曲《国际歌》就有可能被送上绞刑架的国度。几乎所有这些人到莫斯科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目的的话——都是一睹列宁不朽的风采。

实际上，每天一到下午五时左右，在列宁墓值勤的军官就估计一下排队的人数，然后将队伍由中间的某一个地方截断，宣布在这一点之后的人们不用再排队了，今天不能瞻仰，明天再来吧。于是这些人只好很不情愿地散去，怀着深深的遗憾心情度过当夜。而在这一点之前的人们则可以当天瞻仰。于是他们便感到很幸运。眼下正在红场上站队的这一两百个人就是这种幸运的人们。

在三十年代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里，莫斯科，这个世界革

命的大本营；克里姆林宫，这个大本营的大脑，曾使得世界各国的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之向往、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牺牲呀。自然，所有的人们都清楚，在这个红色首都大本营的大脑之中，有一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中枢神经。

此时此刻，一九三四年秋天的某一个黄昏，在克里姆林宫院墙深处的一座原先是沙皇枢密院的楼房的二层楼上，在一间装有高高的拱形柞木天花板，墙的四壁镶有浅色柞木胶板，地板上铺着绘有高加索山峰图案的深红色地毯的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位身着浅黄色布质军便服，足登黑色马靴的中年人，正俯身在一张巨大的、特制的写字台前。他大约五十来岁，生着一颗硕大威严的头颅，双肩宽阔，两臂结实有力。在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精明、严峻的深目，唇上蓄着两撇很有风度的八字胡。如果细心观察，从近处还可以看出他面颊上留有幼年时期生天花后遗下的若干个麻点。不过，在当时恐怕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对他进行这种近距离观察的。他，就是名闻全球的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共产国际实际上的主要决策者——约·维·斯大林。

在这个仲秋的黄昏时节，在这个斯大林一天之中办公的“黄金时刻”，有多少紧急的公事等待着他亲自处理呀。在那本被置于写字台右上角的敞开的卷宗内，有关于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最新政治、经济和军事动向的情报；有苏联科学家设计的新式战斗机和火炮准备成批投产的请示报告；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上报拟逮捕的干部的审批名单；有关于组建苏联太平洋舰队以抗衡日本的请示报告；有在乌拉尔地区新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选择报告；甚至还有拉丁

美洲某国新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宣言文本和领导人名单。

然而，斯大林此时并没有去考虑和处理这些都被报告者称为“十万火急”的事情，而是一边近似下意识地往自己握在手中的那个全苏联几乎人人皆知的弯曲的硬木烟斗中添烟丝，一边在凝神沉思。

原来，斯大林刚刚阅毕一份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递交的紧急报告。此刻，它还放在写字台的中央。那是一张白色的十六开的打字纸，上边压着一支斯大林惯用的削好的红蓝双色铅笔。

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请示报告——这类报告每隔一段不等的时日斯大林总得批阅一份——都译在这种薄薄的打字纸上。这种纸纸面光洁，割边整齐，不是苏联的产品，是德国生产的。当时苏联高级办公用纸也很匮乏，某些重要机关的办公用纸需要从欧洲进口。眼下，这张薄薄的报告译文安闲地躺在斯大林的写字台上，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过千钧！

斯大林沉思着，将目光又投到那份紧急报告上，那一行行清晰的、排列整齐的俄文字母便又一次赫然跳入他的眼帘：

国际：瑞金政治局来电，目前敌对我中央区之围剿难以打破，红军回旋余地日蹙，兵力消耗很大。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计，拟全军突围，西进开辟新苏区。

在报告译文的天头上，有一行由季米特洛夫、库西宁、曼努依尔斯基、米夫和王明*等五位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共同签

* 季米特洛夫、库西宁和曼努依尔斯基均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米夫和王明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正副主任。

名的短文：“请斯大林同志阅处。”无疑，没有斯大林的定夺，这个重大决策是无法作出的。

早在几个月之前，鉴于战局不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中央红军由江西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同意。在莫斯科的人们——不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几乎一致认为，放弃江西的中央苏区就意味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重大失利，而这个失利必然给共产国际和苏联都带来政治上严重的消极影响。自然，对斯大林的崇高威望也有损害，谁不知道斯大林特别关心中国革命呢。何况，只要不健忘的人都会记得，仅仅在不到一年之前，中共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发言中还公开宣布中国红军已经决定性地粉碎了国民党新的反革命“围剿”！而今，红军一旦退出江西苏区，又怎么好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舆论界圆场？

斯大林将目光由报告译文上收回，从容不迫地，也可以说动作缓慢地从写字台侧面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盒精装的火柴，打开来擦亮一根，点燃烟斗，然后就一下接一下地吸起来。霎时，在他的写字台的上方就形成了一圈淡青色的烟雾。烟雾的小圈圈缓缓地向天花板上升去，越升得高烟雾就越淡，直到最后难以分辨出来，全部溶入那乳黄色的柞木天花板贴面中去。

从这份报告的后面，斯大林敏锐地察觉出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简单地讲，就是在中国的政治天平上发生了一个后果此时尚难以充分估量的重大变化，而这个重大变化又势必严重地影响到远东以至世界的政治力量对比的总的平衡。

中国，这个广大而辽阔，神秘又纷乱的国度，尽管斯大林

从二十年代初就任苏俄民族人民委员时就开始涉猎东方及中国问题，从一九二六年中国大革命兴起后就更热心地研究中国问题，并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赢得了一个“中国革命问题专家”的称号，但他仍然感到自己对于中国发生的事件和变化捉摸不透。那众多的政治力量，纷繁而又不合乎经典作家理论规范的阶级和阶层，那古怪的东方人性格和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再加上近几年日本人的野蛮侵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反响，真使近年来中国政局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

其实，斯大林心绪烦闷已经有一些日子了，这当然主要地不是中国问题造成的。使斯大林心情不佳的主要原因乃是世界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在欧洲，法西斯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和苏联最危险的死敌，继意大利之后又在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德国夺得政权并实现了全面专政，从而迅速地走上了扩军备战的道路。希特勒，这个反共狂人在他数年前发表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赤裸裸地宣称，德国的扩张必将肢解苏联，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不共戴天。在东方，军国主义日本崛起，三年前一口吞下中国的整整一个“满洲”，随后又在上海动武，并陈兵苏联远东边界。不消说，谁都知道俄国和日本是远东的一对世仇。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对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一直态度暧昧，甚至多方鼓励。尽管它们有时候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也站出来反对一下，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信不移的：西方大国对苏联决不会抱什么好感，只要不是严重地侵犯到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是很乐于看到苏联被德国和日本所扼杀的。

这样，苏联就一下子面临着德、日两国东西夹击的现实危

险了。而苏联，这个全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却没有任何一个值得一提的盟国。这样，在即将来临的这场世界规模的大搏战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环境的确是相当危险的。

为了对付这个对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巨大威胁，斯大林已经苦苦地思虑了几个月了。他需要对苏联的安全负责，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负责，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负起这个责任来。他是个注重实际，对现实异常敏感的人，一旦想通了一种方针之后对以前政策的转变就十分猛烈。在欧洲，共产国际从这年春天起迅速实行了联合一切力量反对纳粹德国的新战略，坚决摒弃了以前实行的排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感到以前奉行的政策太不明智。当然，斯大林决不允许别人议论以前的政策失误，甚至也不愿意让别人想到此事。他宁可说当时的政策是对的，是有一定原因和道理的，如今的转变则是因为时过境迁，也是对的。

在远东，在中国，此时对苏联威胁最大的自然已经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一九二九年他们竟敢在中东铁路对苏联动武——而是骄横的日本军阀了。日俄战争的悲剧——对俄国人是悲剧，对日本人则是节日——才过了不到三十年。俄国老一辈的人对它还记忆犹新。无疑，在中国应当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否则苏联的远东地区就危在旦夕了。那么，在中国谁能充当这个角色呢？前一段斯大林一直认定这个角色应当由中国的红军来扮演。这是因为，几年来中共的力量发展迅速，已经有了二三十万红军和若干块苏区，甚至还一度攻克过省会一级的大城市。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又剿灭不了红军，内部还混战不休，业已出现总崩溃的迹象。但是，近一两年来

他的这种看法却为由中国传来的一些消息所冲击、所动摇了。国民党南京政权并没有全面崩溃，相反在军事上还表现得似乎挺有力量，它不仅仍牢牢地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连县城的绝大部分也仍在它的手中。两年前，南京政权将长江北岸的红军主力削弱并驱入四川，又次第翦平了几支地方势力的起事。眼下，它围攻江西中央苏区颇为得手，迫使瑞金政治局——斯大林这么称呼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区别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莫斯科的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几次要求突围转移，这的确使斯大林感到震惊和不安。不过斯大林可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看法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经常改变看法就意味着不英明，而自己则是一个英明的领导人，不是一个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的“动摇者”和“犹豫不决者”。

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认为，中国红军必须保存下来，最好能发展壮大。眼下，他必须马上作出决断，以便立即给中共中央复电。作为一个对指挥战争内行的人，他很清楚：军情紧迫，误不得事。他在权衡两个选择：一是让红军在江西苏区坚持下去，这块苏区是全中国最大的一块苏区，其地理位置也很理想，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比较接近，有利于在条件成熟时一举推翻南京政权在全国的统治，而且这儿还设有中华苏维埃政府，政治影响也很大；二是立即同意瑞金政治局的要求，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直觉告诉他，前一个办法行不通，得冒很大的风险，也许会从此葬送掉中国的红军运动。他能体会到，如果不是到了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瑞金政治局是不会多次主动提出放弃经营数载的江西苏区的要求的。看来，需要最后决断，不能再犹豫了。他将那个业已燃尽的弯木烟斗摆在大写字台上，眯起那双细长的、具有亚洲草原

民族特点的黄褐色的眼睛，不急不徐地擎起插在笔座中的那支粗大的黑色台笔，在一张宽大的公文纸上批道：

波奇卡同志：请会同皮特尼茨基同志速到我处一晤。

写毕这一句话之后，斯大林用花体在公文纸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将公文纸与报告译文一起用一个小别针别在一块，伸手按了一下装在写字台边上的电铃。随着一声清越的铃声，外间一位已近中年的值班军官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来，举手向他敬礼。斯大林用低沉的嗓音吩咐道：“请即送中共代表团。”

“是。”军官朗声应道。他拿起公文纸后又向斯大林致了一个军礼，便转身离去了。

值班军官知道，公文纸上起头的波奇卡同志乃是斯大林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俄国化名波波维奇的简称。自然，他并不清楚，王明对此一直感到很高兴，将其视为斯大林对自己的一种爱称，就象许多俄国人称柳杰什卡娅为柳霞、彼得罗维奇为彼特一样。他这么认为也并非没有一点因由。斯大林喜欢王明，欣赏他的文采和理论水平，而且只对王明一个人使用这种令人感到亲切的简称。斯大林准备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最后商讨一下如何回复瑞金政治局的来电。

处理毕这份至关重要的报告之后，斯大林感到大大地了却了一桩心事，不由得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他又从抽屉中取出一盒精装的香烟，由中间抽出一根来剥开揉碎，将烟丝装

入他的烟斗之中，点燃烟斗，深深地吸起来。随后，他才开始着手批阅送到他写字台上的其他要件。

二

翌日下午两点钟，一长列黑色的小汽车，足足有七八辆，由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林木茂盛、幽静安谧的别墅区开出来。那扇足有两米多高的、厚实的、装有对外监视孔的木板门打开来，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由里边鱼贯而出，缓缓地驶下山岗。这里是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最喜欢住的地方——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市沃伦镇边上的一处别墅区，也就是后来人们常常在回忆录中提起的斯大林孔策沃别墅。

黑色的车队由山谷中钻出来，飞快地行驶在专门通往别墅的林荫道上，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本人坐在哪一辆轿车中。林荫道边上那一排排茁壮的白桦树虽然已经开始飘零落叶，但总的看起来依旧枝繁叶茂。车队在距通往明斯克的公路岔路口处不远的地方几乎平行地驶上通往莫斯科市区的公路，又前行了一会儿，就沿着陀罗格米洛夫街进入了莫斯科市区。

车队一进入市区，每个十字路口的交通民警都认识这列非同寻常的车队——因为这列车队几乎每天都准时通过这些街口——于是马上为它打开绿灯。直到车队驶过红场，驶入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大门之后，民警们才放松一口气，“今儿又一切平安。”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独特。他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中午十二时起床，然后用“早餐”和读报刊。下午二时左右乘车离

开孔策沃别墅，赴克里姆林宫。三时左右正式办公，到晚上七八点钟再吃“午餐”。然后继续办公到夜里十一时左右才动身返回别墅。回到别墅后他再进“晚餐”，这时通常是晚间十二时左右。然后他继续办公，孔策沃别墅内也有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一般还要再工作两三个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走进那间与办公室相连的小房间休息，那儿有一张作为他的床铺的长沙发，沙发边上放着一张小桌，上边放着三部不同功用的电话机。当然，在他休息的时候通常是不用这些电话的。办公室外边的一个小房间，是他的卫队长的卧室，休息时间由外边打来的全部电话都先由这位卫队长来接。诚然，休息时间打来的电话是非常之少的。因为知道斯大林这个独特的作息时间的人是不会在这段时间打来电话自讨没趣的。而不了解斯大林作息时间的人则根本不会打来电话，因为这种人既然连斯大林的作息时间都不知道，那就更不会知道这绝密的孔策沃别墅的电话号码了。因此，斯大林的这段休息时间是相当有保障的，即便有哪个人由于疏忽等原因在上午打来电话，卫队长也会训他几句，让他过了十二点钟再打来。

这天下午三点钟，斯大林按自己的工作时间刚刚正式办公，外间的值班军官就转来一个电话。对方当然不会是一般人，那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打来的。这时斯大林正着手审定一份处于地下状态的德共中央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委会发出的关于两党联合反法西斯的倡议书，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对许多国家的党都具有普遍意义。

斯大林很不情愿地拿起话筒，心中想到：“这个波波维奇，

什么都不错，就是实际工作能力太差，大大小小的事儿总爱来请示。”

“嗯，我是斯大林。”他对着话筒讲道。

耳机中传来一个纯熟的俄语声音，这是标准的莫斯科市的俄语，绝不带那种外省以至异族人讲俄语时所难以完全避免的怪音调，同时也没有世居莫斯科的人们讲话时所常有的一种难听的喉音，而是一种相当接近电台播音员的俄语。

“啊，斯大林同志。”听筒中的那个年轻的声音带着由衷的敬意，“我是波波维奇。您的批示转到我这来了。我们随时准备到您那儿去，并且……”

斯大林没听出王明到底要讲什么事，又急于结束这个电话以便去处理那份德共的倡议书——他的思路还没有从那里转出来——于是不客气地打断了王明的话头，讲道：“好，我知道了。你们晚间来。”然后就将电话挂断了。

如同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斯大林的确很喜欢王明，认为他是中共第一流的理论家。但他对王明处理实际问题的某些方法也有不满，眼下就又是一例。“来见斯大林何必同他本人联系呢？不必要嘛。”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常称自己为“斯大林”，而不用第一人称的代词“我”。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斯大林只好放下手头的事又拿起话筒来，凡是能转到这间办公室来的电话都不是一般的电话，不能不接。

“斯大林同志，我是波波维奇。”

“哼。”斯大林应了一声，显然是不满了。

“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再次向您汇报。从前天起莫斯科与上海中央局的电讯联系就被切断了。上海的两部

电台都叫不通。这次发去的电报也没有人接收，估计上海局出事了。没有统一的密码，我们与江西中央区无法直接联系，怎么办呀？”

显然，电话线那一位年轻人着急了，连话音都带着一丝哭腔。

斯大林闻听不由怔了一下，立时感到中国局势恶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电讯中断可太不妙了。然而，斯大林毕竟经验丰富，头脑冷静。他略加思索后立即发出新的指示：“马上选派一名信使，携密码回国，走满洲。人一定要选准，最好选派一个与国内政治局的同志相识的人，要绝对可靠和机智。”

“是。马上选派信使归国。”年轻人应道，语气一反刚才的优柔寡断，又变得同平常一样有信心了。他深恨自己怎么连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具体解决办法也没有事先想到，还让斯大林先讲出来。“真是太不应该了。这会在领袖心目中造成多么不佳的印象呀。”他在心中自责着，同时小心翼翼地问道，“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指示吗？”他深知斯大林的时间太宝贵，不敢多耽误一点。

斯大林沉思片刻之后讲道：“事关重大，最好再选派一名预备信使，走新疆归国，盛世才会帮忙的。不过这条路障碍很大，不能抱多大的希望。”

“是，一定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办。”王明讲道。

“那好，就这样吧。你们明天再来吧，先把赴中区的信使选出来。”斯大林说着挂上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斯大林的心思仍在中国问题上萦绕，用不到别的问题上去，也打断了他审阅那份德共的倡议书的思路。他不停地在自己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内踱步，由于地板上铺